

第一章 政权在拜上帝会中孕育

第一节 拜上帝会宗教组织的存在

太平天国农民领袖洪秀全，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穷苦知识分子，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饱读经书、奔波科场中度过的。从道光七年（1827年）起，洪秀全曾多次赶考，却连个秀才也未能考中。个人仕途的坎坷，与国家、民族的灾难交结一起，激发了他的反抗思想和改造社会的愿望。但是他把理想真正变为行动，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应考再次受挫，偶尔阅读了 10 年前（据有人考证在 1833 年）得到的《劝世良言》，深受启发，决心皈依上帝，与冯云山、洪仁玕、李敬芳创立拜上帝教以后的事。洪秀全毅然毁掉了孔子牌位，失去塾师职业，决定“出游天下”，走向广阔的社会，大力宣传“真道”。1844 年 4 月，洪秀全与挚友冯云山等先在广东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等十数府县传教，应者寥寥，又辗转来到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下文同）赐谷村传教，仍收效甚微。但他并未因此而气馁，认真吸取教训，决意返回花县，从事新宗教理论上的创造，以祈再展宏图，力争实现美好理想。但是，人各有志。冯云山却坚持革命实践斗争，留在广西继续宣传“真道”。他抱着“谋国”大志，不畏艰险，只身来到紫荆山区，先打短工，后作塾师，以塾师为掩护，在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开展宣教传道组织活动。历经两年，出人意外地做出了很大成绩。对此，《太平天国起义记》作了这样述

说：“云山在紫荆山地区数年，以巨大的热诚传教，获得成功，有很多人，甚至全姓全族的人，受了洗礼，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些宗教团体，聚集在一起进行宗教礼拜，很快就以‘拜上帝会’之名闻名于远近。”^①这段话，透露出鲜为人知的情况。冯云山的成功表现在：一是打破了他与洪秀全起初在广东以及在广西贵县传教的沉寂冷落的局面，在一个“地辟而险”的紫荆山山区，居然发展“拜上帝之教徒未久即有逾二千之多，其数且日增”。^②二是在教徒越来越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宗教组织实体——拜上帝会。

不过目前学术界对洪秀全、冯云山是否建立“拜上帝会”组织，存在较大歧异。争论的问题之一，是上述韩山文的记录材料提到的“拜上帝会”是“自称”或是“他称”。的确，仅就这段话（包括英文原文），是无法确切判定“拜上帝会”是“自称”还是“他称”，还必须借助别的材料才能判定。然而，在搜求别的材料时，人们又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在太平天国官书和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人的记载中，却没有发现“拜上帝会”这个名称，相反，“拜上帝会”这个名称却在清方记载中屡屡出现。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即究竟是太平天国文献记载可信呢，抑或是清方记载可信？纵观上述争论，我们认为所谓“拜上帝会”是“自称”或者“他称”，恰恰说明“拜上帝会”的存在，而不能证明“拜上帝会”的不存在。不能因为不是“自称”就否定“他称”的存在，因为不论“自称”或“他称”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否则所谓“自称”或“他称”的争论就毫无意义了。同样，不能因为太平天国文献不见“拜上帝会”的名称记载，而清方记载中屡屡出现“拜上帝会”名称，由于清方是敌方，就可以轻易判定清方记载一概不可信。也不能因为太平天国文献没有记载，而简单作为否定“拜上帝会”不存在的根据，归根还是要看“拜上帝会”的存在到底是不是事实。

①②：太平天国（六）第 853、857 页。

要解决这个问题，弄清事实固然是第一位的，而在思想方法上也有改变的必要。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深入考察“拜上帝会”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它具有的特点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长期以来，人们对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李敬芳在 1843 年创立的是‘拜上帝教’，抑或是‘拜上帝会’，可说是模糊不清的。但也有少数学者一开始就断定洪秀全等 1843 年创立的是拜上帝教，根本没有创立过“拜上帝会”，直到金田起义都是一伙“拜上帝的人”发动的。与这一观点紧密相连，他们又提出‘拜上帝会’这个名称‘是一些地主、官僚的奏报和记载’提出的，太平天国文献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断定‘后者应该更可信一些’。^①这种认识，事实上在史料的运用上或者在逻辑推理上都有斟酌的必要，所以无法令人信服，这就是引起上述争论的缘由。

的确，在 1843 年洪秀全等人决心皈依上帝，创立的是拜上帝教而不是拜上帝会，这是历史事实。这是因为在当时还不具有建立拜上帝会的条件 首先是洪秀全等人当时仅从《劝世良言》中，初步领悟到“上帝”独一真神的无上权威，和获得上天堂之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从而萌发出以教传道，改造世道人心，斩邪留正，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人民。这无论是从出发点和实践活动上看，都未超出宗教活动范围。尽管洪秀全内心埋藏着对现实黑暗社会不满和反抗思想，甚至冯云山一开始就有‘谋国’大志，但这些思想还只停留在他们潜意识之中，因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主张。事实上，在客观上也不具有实现其深层思想的条件。何况，他们起初的宣教活动并不成功。虽然跋涉山川，千辛万苦，历经艰难，在广东清远受洗者才五六十人，而在广西贵县受洗者也仅逾百人。正是这种不景气的现实，才促使洪秀全决心返回花县，希图经过从事新

①：《太平天国兴亡史》第 18 页。

宗教理论上的一番创造，开辟一个新局面。所以，在这个时期不仅洪秀全等没有建立拜上帝会的思想，而且事实上也不具有建立拜上帝会的客观条件。因此，一开始只能从事拜上帝教的宗教活动，而不可能建立起拜上帝会这样一个宗教组织团体。

然而，连洪秀全也没有想到，他的理想，却由留在广西的、热衷于革命实践活动的冯云山来实现了。我们从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活动中可以看出，一开始就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公开遥奉“洪先生”为教主，向群众宣传拜上帝，但暗地里扎根串连、访贫问苦，特别关心贫苦农民的现世利益，保证大家拜上帝后“有吃有穿”、“无灾无难”，以至将他向贫苦农民所许的这个愿，注入拜上帝教的仪式之中。那么，冯云山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把他对贫苦农民所许的这个愿加以兑现呢？固然可以借助“上帝”的神威给予贫苦人民以精神寄托，但是空洞的宣传，终究是无法使最讲究实际的贫苦农民信服的。既然冯云山所许的愿不能立即兑现，那么他至少要给人们指明通向天堂，永享天福之路。联系到当时历史实际，唯一的道路，就是组织起来，铤而走险，推翻清王朝，这也就是冯云山所谓的“谋国”的大志。当然，冯云山当时是不可能用这样明确而激烈的言词告诉群众的，恐怕如此宣传贫苦群众也未必能够接受。冯云山只能用宗教的语言，但又包含着政治的内容，将他的本来意图巧妙地灌输给群众，否则群众就会永远停留在不觉悟的状态之中。事实上无论是洪秀全或者是冯云山都不是职业宗教家，他们宣教的实践活动，都不可避免要带有政治色彩。只是这种政治色彩是不露声色的，无法使外人察觉罢了。可以说，这就是洪秀全、冯云山能获得成功的一个奥秘。

从冯云山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最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位革命家，这从他在 1847 年被捕后为自己所作的辩护词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来地主王作新强加给他的“罪行”是：“迷惑乡民，结盟聚会”；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但

是，冯云山针锋相对，给予严厉驳斥，说他是“遵旨敬天，不犯不法”，“一切上帝当拜，古今大典，观广东礼拜堂悬挂两广大宪奏章，并皇上准行御批移文可查”，^①。这个驳斥是强有力的。因为他将当今‘皇上’的‘御批’搬出来做自己的护符，于是把他的活动一概说成是“遵旨”而行。这样他一开始就站到置地主王作新于死地的制高点，弄得地方官吏哑口无言，不知所措，最后只好将其无罪释放。这可说，是洪秀全、冯云山能获成功的第二个奥秘。从这个意义上，洪秀全、冯云山可以说是近代一切维新家、革命家进行合法斗争的鼻祖。从当时地方官吏始终未发现他的‘造反’证据来看，他的革命活动是十分严谨的，其策略手段是相当高明的。

冯云山被捕而获无罪释放，这是整个‘拜上帝之人’的胜利。这个胜利初步显示出“拜上帝之人”是很有力量的。其力量显然是来之“拜上帝之人”严密的组织性，而不仅仅是其宗教信仰维系之故。这样，自然就会使人联想到有关‘拜上帝会’存在的记载。冯云山在紫荆山区从事宣传拜上帝有两年的时间，既然拜上帝之人与日俱增，再联想到他们远大的斗争目标以及现实斗争复杂情况，这说明在当时建立一个宗教团体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个宗教团体从一开始就是秘密的。其公开进行的是宣传拜上帝，暗地里也许正如王作新说的，是‘结盟聚会’，即组成一个宗教组织的实体——拜上帝会，作为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本来采取‘秘密结社’或‘会党’形式进行反封建斗争，就是农民进行斗争的传统形式，实际上也是近代各阶级、阶层进行反清斗争所普遍采取的形式。

那么，太平天国有什么理由要抛弃这个行之有效的斗争形式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借助外来的宗教所致吗？事实上，外来宗教不仅不排斥这种形式，恰恰同样也借用这种形式。我们知道，西方国

^①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第 83 页。

家就有基督教会的存在。外国传教士，比如郭士力在拜上帝会出现之前就在中国建立过“汉会”，甚至据记载包括冯云山在内的拜上帝会的一些骨干分子都曾与“汉会”发生过联系，那么，洪秀全、冯云山等为何不可以在条件成熟之后，建立一个宗教组织团体——拜上帝会呢？应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拜上帝会与基督教会或“汉会”不同，直到金田起义之前仍是一个秘密的宗教组织团体。这固然是继承了中国秘密社会的传统，更重要的还是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出于斗争策略需要才这样做的。因为在当时天地会遍及江南各省，广西几乎所有州县都有天地会的反抗斗争，如果一开始就把拜上帝会宗教团体暴露于世，势必就会引火烧身，把敌人引向拜上帝会，也就不利于拜上帝会积蓄力量，和不断发展壮大。事实上这个策略思想，也是在太平天国发动金田起义前所采取的一个基本斗争策略。《天兄圣旨》就有许多这样记载：萧朝贵代“天兄”传言经常告诫会众，因“妖魔作怪”，想“败”天王的“江山”，所以“根机不可被人识透”。特别明确提出“要避吉先。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意，然后天父及天兄自然有圣旨分发做事也”。^①这里的“妖对妖相杀尽意”，即指待天地会与清军对杀都精疲力竭了，然后再决定起事。既然拜上帝会是个带有政治性的秘密组织，所以它的名称就不可能在太平天国文献出现。而一旦起义之后，所有的拜上帝会众都聚集在太平天国旗帜之下，被编入组织严密的太平军之中，拜上帝会作为宗教团体已完成历史使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而便自行消亡了。所以在起义之后，可能还因一些别的原因，在正式旨准颁行的太平天国文献中仍未加以追记。

说“拜上帝会”的存在不容置疑，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值得提出，即当时冯云山在紫荆山以外所开辟新的传教基地，都推出各

^①《天父天兄圣旨》第45、46页。

自的代表，成为一方首领，并在起义前夕多次聚会议事，接受“天兄”旨命。一旦团营令下达，各方拜上帝会立即行动。尽管当时会众分散在四面八方，起义会众都带着妻儿老小，跋山涉水，路途上还常遇到地主团练的堵截或尾追，但却奇迹般地战胜重重困难，按照预定时间，有条不紊地顺利到达金田。试想，若不是有拜上帝会组织做保证，而仅仅靠一伙无组织的‘拜上帝的人’，怎能实现团营任务，并胜利发动起义呢？

所以说，无论从哪方面说，拜上帝会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实体是存在的。不仅如此，正是因为拜上帝会的存在，才逐步产生出其领导核心，确定了洪秀全的天王至尊的领导地位，制定出正确的起义方略，并在起义前夕安排了天王‘登极’，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授命军师，为未来农民政权搭起了一个构架。

第二节 “桃园结义”与“三位一体”

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的形成，是金田起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最初形式如何？迄今在众多的有关论著中都未交待清楚。以下就此问题作些探讨，发表一些看法。

（一）‘桃园结义’领导体制的建立

冯云山自 1845 年春进入紫荆山，到洪秀全 1847 年夏二次来广西为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历经千辛万苦，深入广大贫苦农民之中，宣传拜上帝，创建拜上帝会，最后开辟出横跨两广十数府县的斗争基地，为金田起义的发动作了准备。但严格地说，这场农民运动还不是由此开始的，甚至也不是有的论者所说是从洪秀全第二次到广西开始的。这场农民运动的真正开端，应该是在杨

秀清、萧朝贵取得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身分之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此之前拜上帝会领导核心还未形成，因而不具有明确的斗争方向，运动的性质是不确定的。其事实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冯云山虽然抱着‘立国’的‘大志’，扎根紫荆山区，欲要发动农民，实现改朝换代的伟大事业。但是他的崇高理想没有变成农民的斗争行动，就是洪秀全也不清楚。所以，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区所进行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全部活动，基本上是宣传拜上帝教和从事拜上帝会的秘密组织工作，还只是停留在宗教活动之中，不带有政治色彩。这也是他被捕而能够顺利获释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期间，尽管他结交了紫荆山区热心传教的曾开文、曾玉珍等地主，并利用他们联络了出身贫苦、勇于献身的卢六、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以及在紫荆山之外多方物色到诸如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等草莽英雄，但是，并没有，而且客观上也不具备建立起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

第二，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之后，他和冯云山直接领导的在象州以及紫荆山等地搞的捣庙毁神的活动，虽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仍属宗教活动。这一活动，还看不出有一个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在领导这次活动。

第三，当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偕曾玉璟到了贵县赐谷村后，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即出现群龙无首，大有顷刻瓦解之势，这就充分证实了当时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还未形成。否则，就不至于出现这一次空前未有的危机。

正因为如此，混入拜上帝会的敌对分子，才敢于放肆地在拜上帝会内部制造混乱，诋毁拜上帝会及其信仰，致使拜上帝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难。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在紫荆山拜上帝会中尚未出名的杨秀清，挺身而出，以其超人的勇气和非凡的机智与才能，采用所谓‘天父’附体，把拜上帝会众所崇奉的上帝，从上天‘请’到人

间，出人意外地迅速平息了这一场动乱，严惩了进行破坏的心怀叵测的敌对分子，从而团结了会众，重新恢复了拜上帝会的安定局面。

拜上帝会取得这一重大胜利，给予当时主持拜上帝会领导工作的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许多启示。启示之一，他们从中体会到，把“天父”⁹⁹“请”到凡间，让其加强对人世间的干预，则是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所以，在杨秀清取得代“天父”传言身分之后，仅隔半年时间，便有萧朝贵代“天兄”下凡传言的事情发生。萧朝贵代“天兄”下凡传言，与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传言之举是不同的。因为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传言是出于不得已而采取的对策，而萧朝贵代“天兄”下凡传言，是拜上帝会恢复了安定的局面之后，当时拜上帝会不存在内部敌对分子的威胁。不仅如此，诬告冯云山的紫荆山的团练头子王作新经桂平知县驳斥之后，便逃之夭夭，几年不敢回山^①，因此也不存在外部敌人的威胁。显然，萧朝贵代“天兄”传言之举，是拜上帝会采取的从长计议的决策。其目的是继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传言之后，也把“天兄”⁹⁹“请”到人间，协助“天父”直接处理人世间的的事，无疑这会进一步加强上帝的“神威”。其实，所谓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传言和萧朝贵代“天兄”下凡传言，只不过是他们玩弄的把戏而已。所谓的“天父”“天兄”，本来就是虚构的。现实的“天父”“天兄”就是他们自己。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取得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身分，才在拜上帝会中名声大振，异军突起，从而在拜上帝会中占据突出的领导地位。

启示之二，这次拜上帝会之所以会出乱子，给拜上帝会提出了一个严重教训，即当拜上帝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需要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以便加强拜上帝会的领导，应付突发事变。

^①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第 82—83 页。

当然，作为一场农民运动的领导核心的建立，它不是自封的，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客观实践斗争的产物。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就是通过这次大的动乱，经过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才最后形成的。作为拜上帝教的教主和拜上帝会的会首的洪秀全，理应是这个领导核心的轴心。已取得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身分的杨秀清、萧朝贵，通过他们勇敢斗争，在拜上帝会所取得的突出领导地位来看，无疑是领导核心中的主要成员。作为拜上帝教的创始人之一、拜上帝会首创者的冯云山，毫无疑问也应该成为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但是，当他出狱后，面对拜上帝会的变化和经过斗争形成的领导核心，表示不理解，一时难以接受，而且独自回到广东家乡花县，甘居拜上帝会领导核心之外。这表明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形成之后，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当时冯云山究竟是怎样想的，有何具体意见？未曾公开表露，因此无从查考。但是从客观事实情况推断，大概最主要的是对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做法接受不了，以及对由此将会危及洪秀全在拜上帝会的领导地位，可能也存在疑虑。

这个事实说明，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核心的形成固然是实践斗争的产物，但是能否真正建立起来，还需要领导核心成员在主观上共同作出努力。尽管冯云山对在实践斗争中形成的领导核心有不同意见，一时尚难接受，但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对拜上帝会建立领导核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却取得了共识。因此他们之间很快取得相互谅解和相互信任，并使其关系密切化，为领导核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杨秀清、萧朝贵虽然通过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身分，在拜上帝会中占据了领导优势，但不容他们忽视的是，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创始人，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时，一开始就尊“洪先生”为会首。后来洪仁玕在追述到当时洪秀全在拜上帝会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和握有的无比权力时就会说：“冯云山虽是拜上帝会之开创者，但仍承认洪为会中至高首领，威权无能与比，其权力足

以施诸会众各人。^① 由此说明，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所以，杨秀清、萧朝贵在对待洪秀全的问题上，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理智，特别注意到尊重洪秀全在拜上帝会中的崇高地位，并协调好他们与洪秀全之间的关系。杨秀清在第一次代“天父”下凡传言时，就尊洪秀全为“天下万廓之主”^②。随后，在萧朝贵最初代“天兄”下凡传言中，也表示，俟“太平事”成之后，要让洪秀全“登极”，成为“天王”^③。杨秀清、萧朝贵这些表示，对于知书达理的洪秀全来说，是心领神会的。所以，对杨秀清、萧朝贵取得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态度，一开始就与冯云山迥然不同，表现得既冷静又热情。对他们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身分，立即表示经“审判为真者”^④，而加以首肯。以致甘心拜倒在他们的脚下，带头俯首听信“天父”、“天兄”下凡传言。无疑这对树立杨秀清、萧朝贵在拜上帝会的领导威信起到了特殊作用。他们双方采取的这种互相尊重的态度，势必会推动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化。只是由于《天父圣旨》卷一卷二至今还未发现，因此对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关系密切化的事实过程，尚不清楚。但是，根据《天兄圣旨》，对洪秀全与萧朝贵之间关系密切化的事实的记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大约在萧朝贵代“天兄”下凡传言前后，洪秀全就住在萧玉胜（萧朝贵之父）家里，经常“教杨宣娇”（其生父系黄权政^⑤。黄权政与黄为政是何关系？有待查考。如果二者属本家，那么黄宣娇与洪秀全是表亲关系。宣娇改姓杨，这样杨秀清与萧朝贵又有联姻关系。后来洪秀全进一步收杨宣娇为“御妹”，改姓洪，使洪秀全与萧朝贵又建立联姻关系。总之，通过黄宣娇几易其姓，也能看出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化的事实。）读《天父诗》：“天兄”还下凡亲教洪秀全和杨宣娇

①④ 《太平天国》（六）第 867、866 页。

② 《太平天国》（一）第 61、48—49、77、83 页。

③⑤ 《天父天兄圣旨》第 12、9 页。

“二人读书”^①。这说明，此时洪秀全与萧朝贵已建立起莫逆之交了。至于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关系密切化的程度，大概不会亚于洪、萧的亲密关系。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形成过程中，同样也经历过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桃园三结义”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尽管在金田起义前夕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扩大为 6 人，即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但不难看出，这是在“桃园三结义”基础上扩大而成的。从领导金田起义及其以后的武装斗争所起的作用来看，无疑，“桃园三结义”起了领导核心的核心作用。这种领导格局，只是到了 1852 年萧朝贵战死在长沙城下，才有了改变。正是这种领导格局的打破，才给太平天国的历史带来严重影响，使洪杨矛盾逐渐演变成“天京事变”这样一场大悲剧。

也只有认识到太平天国存在着“桃园三结义”领导核心这个历史事实，才会明白，作为拜上帝会的首创者冯云山，为什么后来在拜上帝会领导核心中只能处于杨秀清、萧朝贵之下那种地位；在永安封王时只能被封为南王，而不能被封为东王或西王。也只有揭示出“桃园三结义”的历史真相，才能认识到冯云山领导地位的“下降”并非都是人为造成的，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斗争自然形成的。从而应该承认，太平天国领导核心座次的安排是合情合理的，那种对冯云山的领导地位所谓“下降”的说法，以及由此产生惋惜之情，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历史的进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应该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所产生的客观历史事实。

事实上，在太平天国的文献中明确宣布，领导核心中 6 人都以“同胞”或“兄弟”相称。东王杨秀清申明：“天兄是天父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也。”自我兄弟 5 人（杨以下萧、冯、韦、石诸人——笔

①《天父天兄圣旨》第 4 页。

者按)赖蒙天恩主恩,授封为王,恭承天父亲命,下凡辅定真主。”“朕同胞等皆是亲承帝命下凡,顶天父天兄纲常者。”^①这说明太平天国领导核心是由“桃园三结义”进而扩大为“桃园六结义”而成的。在农民起义中以“结义”的形式建立领导核心,是屡见不鲜的。所不同的,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是在“上帝”的名义下,都以“上帝”之子(尽管有些人的身分是不确定的)而结合起来的。还有不同的是,虽然太平天国领导核心扩大为 6 人,但“桃园三结义”领导体制仍然存在,只是附会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形式出现而已。还要着重指出的是,拜上帝会“桃园三结义”的领导核心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如胡绳同志所指出的,它标志着 19 世纪 50 年代的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贫农和贫苦中农手里的一次大革命,他们是在和游民的破坏性进行了必要的斗争而建立和保持自己的领导权的”^②。笔者认为,这种重要意义,就集中地体现在拜上帝会“桃园三结义”这个领导核心上。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具有中国历次农民战争所没有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也正是具有这一特点,才使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

(二)宗教上“三位一体”形式的出现

由于太平天国的“桃园结义”领导核心的确立,随之在宗教上又有“三位一体”的形式出现。的确,包括洪秀全在内的太平天国所有领导人物,他们对西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深奥含义始终也未弄清。其实,对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来说,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去搞清基督教教义以及什么“三位一体”的含义,这方面外国传教士们曾多次对他们加以指责,在这里无须多说。但是,外国传教士们

① 《太平天国》(一)第 48—49 页。

②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 96 页。

不可能理解,对太平天国领袖人物来说,那些都不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从西方基督教中摘取适合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些形式。所以,他们不仅摘取了作为基督教信奉的独一真神的“上帝”这个形式,而且,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这个形式也被他们曲折地采用了。

按照西方人的理解,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尽管拜上帝会的领导也让会众跟着基督教徒高唱:‘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①实际上,他们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含义并不理解。对于‘三位一体’中的‘圣父’、‘圣子’是容易理解的,至于什么是“圣灵”,可以说洪秀全等人至死也未搞清楚。特别当时人们将“圣灵”翻译成‘圣神风’,就使得洪秀全等更加费解了。尽管如此,洪秀全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揣对基督教知识的浅陋,还是大胆地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盖天父上帝是独一真神。独一圣神上帝曰:‘除朕外不可有别神别帝也。’圣神即是上帝也。若另有圣神,则是有别神矣,即圣神风,亦是圣神上帝之风,非风是圣神也。风是东王天上使风者也。圣神自圣神,风自风,一而二,二而一,子由父生,原本一体合一。但父自父,子自子,又合一,又分开也。如今上帝下凡降东王,降托东王是圣神,东王本职则是风,劝慰师也。爷知新约有错记,故降东王诏证,圣神是上帝,风是东王。又知凡人误认基督即上帝,故上帝降东王,以明神父在是,基督降西王,以明太子在是。父自父,子自子,兄自兄,弟自弟,一而二,二而一,一下凡间,而名份定矣。”^②就这样,洪秀全把“圣灵”——“圣神风”作为职务名称,稀里糊涂地加在杨秀清的头上。

实际上,太平天国领袖们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无意深究,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借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这个形式,创造一个

① 《太平天国》(一)第 77 页。

② 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 85 页。

适合自己需要的“三位一体”。那么，他们究竟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三位一体”呢？的确，太平天国的文献中见不到他们有过专门明确解释，因此也就容易被人们忽略。但是如果我们细心阅读考究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拜上帝会确实存在“三位一体”的形式的。这个“三位一体”就是下凡的‘天父’和下凡的‘天兄’以及“天下万廓之主”的‘天王’。何以见得呢？不妨细心阅读一下《天兄圣旨》及太平天国有关文献，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之后，也就能发现拜上帝会的‘三位一体’的形式存在。

如据《天兄圣旨》记载，一次‘天兄’吩咐黄权政（杨宣娇生父，萧朝贵的岳父），毁除家中各邪神，黄有顾虑，回家后即打发其妻及子到萧玉胜家复问‘天兄’基督。萧朝贵便代‘天兄’下凡传言：“尔回去毁除各邪神。尔说道奉天父皇上帝命，奉救世主基督命，奉君王全命，则百无禁忌。”^①联系到《天条书·灾病求上帝》一节所说：“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②以及前边所引洪秀全的‘一下凡间，而名分定矣’的话，这就说明下凡的‘天父’和下凡的‘天兄’，其地位和作用‘在地如在天’；‘一下凡间’；名份‘就确定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赞美诗中便写了‘奉上主皇上帝命，奉救世主耶稣命，奉天王大道君王全命，百无禁忌’^③诗句，让会众天天唱。如果按照洪秀全的思维逻辑，这就是说，天父自天父，基督自基督，天王自天王，一而二，二而一，天父、天兄、天王‘原本一体合一’。由此而论，不论是下凡的‘天父’或是下凡的‘天兄’，甚至天王所发出的旨命，都代表天父、天兄、天王‘三位一体’的旨命。为此，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传言说：“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④所以从下团营令开始，洪秀全发出的一切诏令，实际上也就是下凡的‘天父’和下凡的‘天兄’的旨命。如果说穿

① 《天父天兄圣旨》第 9 页。

②③ 《太平天国》（一）第 77、83 页

④ 《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 590 页

了，也就是杨秀清、萧朝贵的旨命。不难看出，如果剥去宗教的外衣，拜上帝会的领导者所创造的这个“三位一体”，实际上也就是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三位一体”。这种做法，无论在宗教上或是世俗政治上，都体现出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三巨头的集体领导，这对增强拜上帝会的凝聚力，保证宗教的和政治的旨令的统一，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树立“三位一体”在拜上帝会众中的绝对权威，他们甚至向拜上帝会众提出，对“三位一体”的态度也就是衡量每个人对这场农民运动是否真心和忠心的试金石。如当胡以晃准备变卖家产参加起义时，“天兄”为此下凡传言，特别召见胡以晃，当面表扬他说：“胡以晃，算尔真草（心）、忠草（心），能识得天父，能识得天兄，能识得尔二兄也。”当胡以晃真的变卖田产以后，“天兄”又下凡传言说：“算尔真草忠草，见得天父，见得天兄，见得尔二兄也。”^①

根据太平天国的“天下一家”和洪秀全是“万国真主”的宗教思想出发，虽然认为天下有“中国”与“番国”之分，在他们认为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是适用于天下万国的。所以，杨秀清在甲寅四年（1854年）五月廿三日，在《答英人三十一条》中，同样向外国人宣布：“我主天王是上帝亲子，天兄胞弟，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是天父上主皇上帝所立，及救世主天兄耶稣所立。我主天王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主宰天下。”^②进而又发出照会，要求外国人认识“我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独一真神，天下万国人之天父。天兄救世主耶稣，是天下万国人之长兄。我主天王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则天下万国皆当敬天从主”。^③

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如果在中国是要求拜上帝之人承认并尊重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身分和洪秀全

① 《天父天兄圣旨》第 39—40 页。

②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299 页。

③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298 页。

受命下凡救世的神话的话，那么，对外国人来说，主要是让他们认识到洪秀全作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是天父上主皇上帝所立，及救世主天兄耶稣所立”，因此，洪秀全“出一言是旨，是天命”。总之，为的都是要神化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从宗教上进一步强化“桃园三结义”核心领导体制，为他们即将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做舆论上的准备。历史事实证明，他们所做的努力，确实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取得金田起义的胜利，而且仅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太平军就攻克南京，建立了农民政权，把这场农民运动推向了高潮。

第三节 君权神授的“符瑞” ——《太平天日》

《太平天日》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发动所起的特殊作用，是为史学界所共识的。因为通过《太平天日》的编制和宣布，才使洪秀全取得合法的王位。但是《太平天日》究竟是怎样编制出来，是由谁编制的，学术界的看法并非是一致，下面就管窥所见，对此进行辨正。

（一）不是洪仁玕或冯云山编制的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不少同志认为《太平天日》为洪仁玕所撰。最先提出此说的，是30年代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太平天日》的王重民先生。他说：

“《太平天日》（36页，缺第2页）书封而署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今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钦遵旨准，刷印铜板颁行，而不著撰人姓氏。以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校之，盖即洪仁玕所撰。‘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者，谓为道光戊申年（1848年）冬